

财政人的大型文学刊物

财政文学

CAIZHENGWENXUE

刊名题字：财政部原部长谢旭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财政文学会主办

总第11期

·卷首语·

高尚品格是前进的力量 胡静林

·重点阅读·

“文革”中苦撑危局的国家财政 王丙乾
陈云打算盘的智慧 曹伟明
母亲在围场骑马挎枪 贺捷生
她牺牲在十八岁花季 刘长琨

·特别推荐·

冷梅及其他 耿林莽
花落人间可化蝶 王世尧
缅怀 岳学鲲
暗香 刘宇辉
耕耘决算 邹平
历史在这里沉思 安立伟
万里流莺入梦来 吴文军
谈琴论士 李挺伟
不惑絮语 李旭鸿
我知我账房 孙卫清
血迹上的花朵 宁新路

·短篇散文·

黄色的无名花 范盈华
石磨琐忆 陈进俊
静水深流 黄雪梅
邂逅诗歌 曾子兰
“老练长”的人生轨迹 刘骁男
野菜里的乡愁 吴孔文

·诗歌·

记得住的乡愁 钱钟龄
巴山情 徐丰
慕美人 陈龙龙
国史 冯昭

·小说·

山道弯弯 周运鑫
罗总管问审 曾海华

·艺术人生·

礼拜默默无闻的生命 蔡劲松

2015.12



《坝上秋色》 禾山/摄

钱

梁实秋/文

钱这个东西，不可说，不可说。一说起阿堵物，就显着俗。其实钱本身是有用的东西，无所谓俗。或形如契刀，或外圆而孔方，样子都不难看。若是带有斑斑绿锈，就更古朴可爱。稍晚的“交子”、“钞引”以至于近代的纸币，也无不力求精美雅观，何俗之有？钱财的进出取舍之间诚然大有道理，不过贪者自贪，廉者自廉，关键在于人，与钱本身无涉。像和峤那样爱钱如命只可说是钱癖，不能斥之曰俗；像石崇那样的挥金似土，只可说是奢侈，不能算得上雅。俗也好，雅也好，事在人为，钱无雅俗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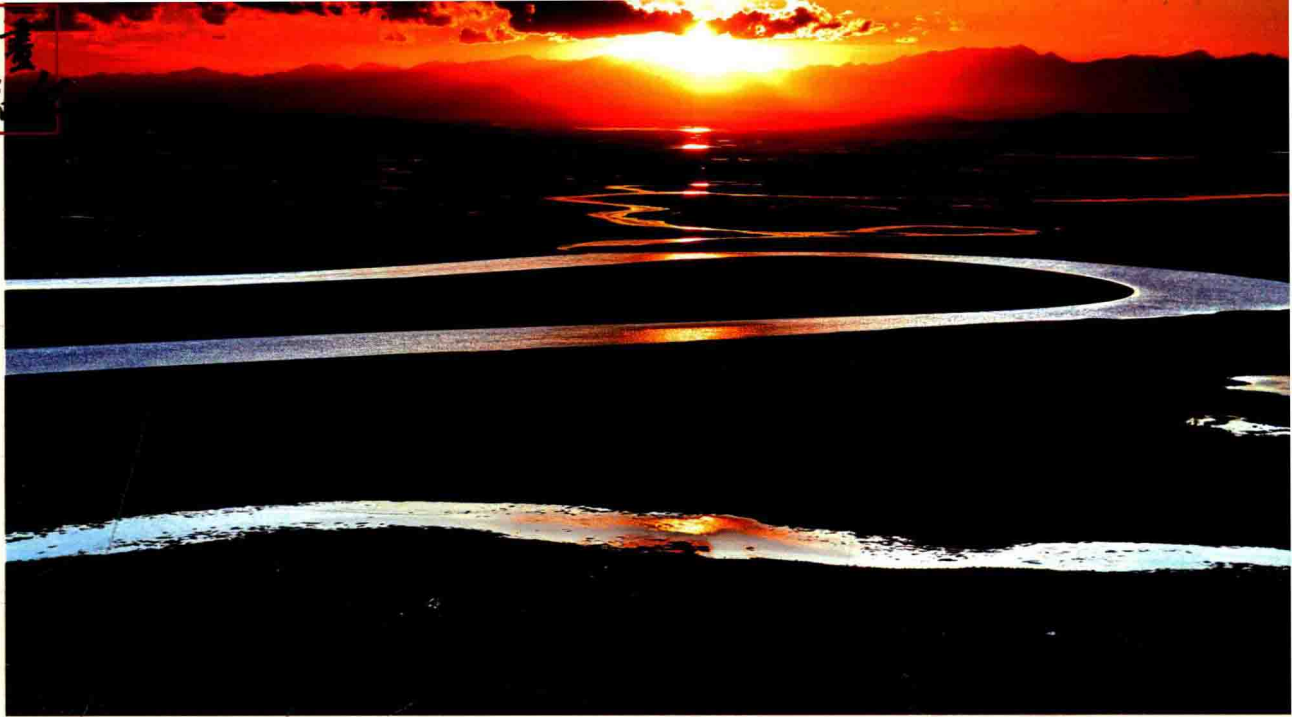
古今中外几乎人人都喜欢收集的却是通货。钱不嫌多，愈多愈好。庄子曰：“钱财不积，则贪者忧。”岂止贪者忧？不贪的人也一样的想积财。

钱多了就有麻烦，不知放在哪里好。枕头底下没有多少空间，破鞋空间里面也塞不进多少。眼看着财源滚滚，求田问舍怕招物议，多财善贾又怕风波，无可奈何，只好送进银行。我在杂志上看到过一段趣谈：印第安人酋长某，平素聚敛不少，有一天背了一大口袋钞票存入银行，定期一年，期满之日他要求全部提出，行员把钞票一叠一叠地堆在柜台上，有如山积。酋长看了一下，徐曰：“请再续存一年。”行员惊异，既要续存何必提出？酋长说：“不先提出，我怎么知道我的钱是否安然无恙的保存在这里？”这当然是笑话，不过我们从前也有金山银山之说，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从前金融执牛耳的大部分是山西人，票庄掌柜的几乎一律是老西儿。据说他们家里就有金山银山。赚了金银运回老家，溶为液体，泼在内室地上，积年累月一勺勺地泼上去，就成了一座座亮晶晶的金山银山。要用钱的时候凿上

一块就行，不虞盗贼光顾。没亲眼见过金山银山的人，至少总见过冥衣铺用纸糊成的金童玉女金山银山吧？从前好像还没有近代恶性通货膨胀的怪事，然而如何维护既得的资财，也已经是颇费心机了。如今有些大户把钱弄到外国去，因为那里的银行有政府担保，没有倒闭之虞，而且还为存户保密，真是服务周到极了。

善居积的陶朱公，人人羡慕，但是看他变姓名游江湖，其心里恐怕有几分像是挟巨资逃往国外作寓公，离乡背井的，多少有一点不自在。所以一个人尽管贪财，不可无厌。无冻馁之忧，有安全之感，能罢手时且罢手，大可不必“人为财死”而后已，陶朱公还算是聪明的。

钱，要花出去，才发生作用。穷人手头不裕，为了住顾不得衣，为了衣顾不得食，为了食谈不到娱乐，有时候几个孩子同时需要买新鞋，会把父母急得冒冷汗！贫穷到了这个地步，一个钱也不能妄用，只有牛衣对应的分。小康之家用钱大有伸缩余地，最高明的是不求生活水准之全面提高，而在几点上稍稍突破，自得其乐。有人爱买书，有人爱买衣裳，有人爱度周末，各随所好。把钱集中用在一点上，便可以比较容易适度满足自己的欲望。至于豪富之家，挥金如土，未必是福，穷奢极欲，乐极生悲，如果我们举例说明，则近似幸灾乐祸，不提也罢。纪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泰蒙，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也吃尽了世态炎凉的苦头，他最了解金钱的性质，他认识了金钱的本来面目，钱是人类的公娼！与其像泰蒙那样疯狂而死，不如早些疏散资财，做些有益之事，清清白白，赤裸裸来去无牵挂。



《九曲十八弯》 禾山/摄

有多少种觉悟叫迷悟

穆涛/文

菩提本无树，有什么呢？

佛学是进口的，是外来的精神。佛进入国门之前，儒学担纲着国人修身齐家治天下的责任。尤其是汉代，一门独大。佛学进国门之初，是奢侈品，被皇家御用，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宋代儒学再度中兴，把佛学从宫廷中排挤到民间。佛门是伟大的，生命力极强，就此落地生根，禅宗便是佛学中国化的产物。外来的精神想中国化，如果不被老百姓广为接受并喜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一段踏实的路要走。

汉代治国养民的大义有“六指（旨）”，“天端，流物，得失，法诛，尊卑，谦义”。天端是顺自然，守天地大规律，德在天地，神明贤集，“木生火，火为夏，木为春，天之端”，“火由木生，为物皆本于春，《春秋》首书春，所以正天端也”。流物是世间百态，以及变幻无极的万物。“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也”。“天端”和“流物”是总则，世道变数的奥秘之理隐于其中。“志得失之所丛生，而后差贵贱之所始也”，影从形起，响随声来。记载得失产生的缘由，可察晓尊卑贵贱差别之义，用今天的话讲，叫考察社会各阶层心理指数。“论罪源深浅定法诛”，法律是保障社会公正的，要有恒温，不可因时而宜，不可人为的从重从快。“载天下之贤方，表谦义之所在，则见复正焉耳”。推表贤良方正之士，彰显谦和礼义，人心则崇尚正道。六指是儒学大道理，汉代不是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是当年的文化大革命。166年和168年，政府两次镇压了几百位儒学大人物，读书人由此开始疏离政治，有了归隐田园心理，及至魏晋、唐之后，形成儒释道三足并存的中国文化局面。宋代的

儒学，尽管再度被皇家器重，但已和汉代是两个天地了，汉儒在社会学范畴，宋儒升腾为理学，给自己留了退路，入了哲学的境地。

《曹源一滴水》是一本禅识录，有意味的是，里边有一辑是历代高僧大德专门回答“如何是道”的。恭录几则：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道远乎哉？”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何不问己？”曰：“自己云何是道？”师曰：“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有路通长安”。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妄想颠倒。”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顶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师曰：“方圆七八寸。”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只在目前。”曰：“为什么不见？”师曰：“瞎！”

僧问：“如何是道？”师便咄！僧曰：“学人未晓。”师曰：“去！”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太阳溢目，万里不挂片云。”曰：“如何得会？”师曰：“清清之水，游鱼自迷。”

僧问：“如何是道？”师举起拳。僧曰：“学人不会。”师曰：“拳头也不识！”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高高低低。”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师曰：“脚瘦草鞋宽。”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拍手笑清风。”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头上脚下。”曰：“如何是道中人？”师曰：“一任东西。”

僧问：“如何是道？”师曰：“砖头瓦子。”曰：“意旨如何？”师曰：“苦。”

财政文学

CAIZHENGWENXUE

财政文学会领导:

会长: 胡静林

财政文学会顾问:

项怀诚 王 军 王 蒙 贾平凹 周笃文 廖路明

《财政文学》编委会成员:

王彦欣 王家新 何杰平 张国才 嵇 明 吴振鹏
邹 平 岳学鲲鹏 苗福生 吕 萍 邱世如 宁新路

主办: 财政文学会

编辑: 《财政文学》杂志社

总策划: 张国才

主 编: 宁新路

责任编辑: 亚 梓 海 萍 莉 娅 时 雨

装帧设计: 杨书光

电话: 010-63803919 68553141

投稿邮箱: czwxzz@163.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财政文学. 总第11期/宁新路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141-6370-4

I. ①财… II. ①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6706号

责任编辑: 于源 孙丽丽

技术编辑: 李 鹏

财政文学. 总第11期

主编 宁新路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 100142

网址: 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com.cn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1092 16开 11.5印张 270000字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978-7-5141-6370-4 定价: 40.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ULU

目录

· 卷首语 ·

高尚品格是前进的力量 胡静林 1

· 重点阅读 ·

“文革”中苦撑危局的国家财政 王丙乾 3

陈云打算盘的智慧 曹伟明 12

母亲在围场骑马挎枪 贺捷生 15

她牺牲在十八岁花季 刘长琨 23

· 特别推荐 ·

冷梅及其他 耿林莽 29

花落人间可化蝶 王世尧 32

缅怀 岳学鲲鹏 35

暗香 刘宇辉 37

耕耘决算 邹平 43

历史在这里沉思 安立伟 52

万里流莺入梦来 吴文军 54

谈琴论士 李挺伟 59

不惑絮语 李旭鸿 63

血写的记忆 李继学 65

我知我账房 孙卫清 68

血迹上的花朵 宁新路 71

· 短篇散文 ·

黄色的无名花 范盈华 85

清晨出发的地方 王济章 88

榛子情 李轩红 95

石磨琐忆 陈进俊 97

邂逅诗歌 曾子兰 101

静水深流 黄雪梅 104

“老练长”的人生轨迹 刘骁男 109

遥远的五月节 邢恩珂 113

野菜里的乡愁 吴孔文 115

水的智慧 傅光明 117

足印 丁腾渊 119

亲情曲 郑秋颖 122

难忘的书 邱德帅 125

爱的诺言 刘浩 128

永远的灯光 鲍邦协 130

成功在于积累 玫昆仑 132

大地的儿女 贾雄伟 134

闺蜜行 魏晓云 136

“苦”与“乐” 杨贤义 139

人生当如四月天 陈玉璋 142

情牵大板水 刘迅 144

静美之旅 陈文丽 146

田园旧忆 徐仁河 149

爱也悄然 王娟 153

朝觐西阳宫 杨璐 155

芍花深处是故乡 孙鸿 157

· 诗歌 ·

丰碑 王冠宾 159

记得住的乡愁 钱钟龄 159

巴山情 徐丰 161

慕美人 陈龙龙 161

远方 张剑峰 162

国史 冯昭 162

情丝轻绾 贾博森 163

村路 王存 164

· 小说 ·

山道弯弯 周运鑫 165

罗总管问审 曾海华 168

“甘主任”的三个没想到 王珊霞 170

· 艺术与人生 ·

礼拜默默无闻的生命 蔡劲松 172

闲情《论语》度春秋 岳蕾香 176

一钱斩吏 程辉 179

· 财政作家书架 ·

吴文军作品集: 《高天厚土鉴梵心》 183

秦凤翔作品集: 《岁月如歌》 183

张维清诗歌集: 《山花风语》 184

宁新路散文集: 《会笑的云》 184

封二: 《坝上秋色》 禾山/摄

《钱》 梁实秋/文

封三: 《九曲十八弯》 禾山/摄

《有多少种觉悟叫迷悟》 穆涛/文

高尚品格是前进的力量

胡静林

拿破仑认为,意志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强大十倍。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说,“人应该诗意地活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人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理想”。高尚的品格,正是在这片化育万物的大地上“诗意栖居”的主宰力量。

德国作家歌德倾其一生心血创作的巨著《浮士德》,描绘了人类纯洁高尚的精神追求与五光十色的物质利诱之间的空前较量。面对魔鬼梅菲斯特的诱惑,浮士德发出了决不沉湎享乐、决不苟且偷生、决不停止奋斗的誓言。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从没有停止过自我完善、自我进步、自我救赎的努力。而人类不断努力完善的,就是激发人们奋勇前进的高尚品格。

何为高尚品格?它是道德境界和品格力量的和谐统一,是职业操守和人生智慧的意识展示,是文明素养和崇高内质的心灵感召,是求真、善德、唯美、向上的精神追求。共产党人中,拥有着高尚品格雕塑的群体画像。毛泽东同志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格震古烁今,他号召共产党员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周恩来同志深受人民爱戴,他信仰之纯洁、爱国之忠诚、为民之尽心、干事之笃实、律己之严格,铸就了一座伟岸的丰碑。方志敏烈士掌管数百万革命经费,自己却身无分文,为革命筹集到的金钱,是一点一滴为了用于完成信仰中的事业——可爱的中国;吴波同志两立遗嘱,将已逾千万的两套住房不留给需要的儿女而如数交公给财政部,践行“一生只做无产者”的崇高信仰;沈浩同志沾满泥土的7双鞋和小岗人按下的186个红手印,均有着沉甸甸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是全体共产党员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也是铸造共产党人高尚品格的试金石。回溯历史,展望当下,正是那高尚的品格,纵贯其间,凝聚成一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伟大力量,催人奋进,引人向上。作为一种无法摧毁、无限旺盛的生命力量,高尚品格让共产党人笃定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扬帆远航!



财政部副部长 胡静林

财政文学

CAIZHENGWENXUE

财政文学会领导：
会长：胡静林

财政文学会顾问：
王怀诚 王军 王蒙 贾平凹 周笃文 廖路明

《财政文学》编委会成员：
王彦欣 王家新 何杰平 张国才 嵇明 吴振翀
邹平 岳学鲲 苗福生 吕萍 邱世如 宁新路

主办：财政文学会
编辑：《财政文学》杂志社
总策划：张国才
主编：宁新路

责任编辑：亚梓 海萍 莉娅 时雨

装帧设计：杨书光

电话：010-63803919 68553141
投稿邮箱：czwxzz@163.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财政文学. 总第11期 / 宁新路主编.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141-6370-4

I. ①财… II. ①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6706号

责任编辑：于源 孙丽丽
技术编辑：李鹏

财政文学. 总第11期

主编 宁新路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100142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1092 16开 11.5印张 270000字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978-7-5141-6370-4 定价：40.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010-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ULU

目录

·卷首语·

高尚品格是前进的力量 胡静林 1

·重点阅读·

“文革”中苦撑危局的国家财政 王丙乾 3
陈云打算盘的智慧 曹伟明 12
母亲在围场骑马挎枪 贺捷生 15
她牺牲在十八岁花季 刘长琨 23

·特别推荐·

冷梅及其他 耿林莽 29
花落人间可化蝶 王世尧 32
缅怀 岳学鲲 35
暗香 刘宇辉 37
耕耘决算 邹平 43
历史在这里沉思 安立伟 52
万里流莺入梦来 吴文军 54
谈琴论士 李挺伟 59
不惑絮语 李旭鸿 63
血写的记忆 李继学 65
我知我账房 孙卫清 68
血迹上的花朵 宁新路 71

·短篇散文·

黄色的无名花 范盈华 85
清晨出发的地方 王济章 88
榛子情 李轩红 95
石磨琐忆 陈进俊 97
邂逅诗歌 曾子兰 101
静水深流 黄雪梅 104
“老练长”的人生轨迹 刘骁男 109

遥远的五月节 邢恩弼 113
野菜里的乡愁 吴孔文 115
水的智慧 傅光明 117
足印 丁腾渊 119
亲情曲 郑秋颖 122
难忘的书 邱德帅 125
爱的诺言 刘浩 128
永远的灯光 鲍邦协 130
成功在于积累 玫昆仑 132
大地的儿女 贾雄伟 134

闺蜜行 魏晓云 136
“苦”与“乐” 杨贤义 139
人生当如四月天 陈玉璋 142
情牵大板水 刘迅 144
静美之旅 陈文丽 146
田园旧忆 徐仁河 149
爱也悄然 王娟 153
朝觐西阳宫 杨璐 155
芍花深处是故乡 孙鸿 157

·诗歌·

丰碑 王冠宾 159
记得住的乡愁 钱钟龄 159
巴山情 徐丰 161
慕美人 陈龙龙 161
远方 张剑峰 162
国史 冯昭 162
情丝轻绾 贾博森 163
村路 王存 164

·小说·

山道弯弯 周运鑫 165
罗总管问审 曾海华 168
“甘主任”的三个没想到 王珊霞 170

·艺术与人生·

礼拜默默无闻的生命 蔡劲松 172
闲情《论语》度春秋 岳蕾香 176
一钱斩吏 程辉 179

·财政作家书架·

吴文军作品集：《高天厚土鉴梵心》 183
秦凤翔作品集：《岁月如歌》 183
张维清诗歌集：《山花风语》 184
宁新路散文集：《会笑的云》 184

封二：《坝上秋色》 禾山 / 摄
《钱》 梁实秋 / 文

封三：《九曲十八弯》 禾山 / 摄
《有多少种觉悟叫迷悟》 穆涛 / 文

“文革”中苦撑危局的国家财政

王丙乾



王丙乾，原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有新作《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等。该书回顾了新中国财政发展的重大历史片段，曾经见证过许多具有首创性的重要事件和政策，对财政工作者来说，是一本了解、研究我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不可多得的教科书和文献。

“文化大革命”十年，政治形势动荡，社会秩序混乱，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国家财政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李先念同志的领导，财政部仍然坚持正常的业务工作，保障了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财政部的主流，在当时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时期，我相继担任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司长、部党组成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开始参与财政部业务领导工作，值得回顾的地方不少，现将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概要说一说。

国家的财政大权不能夺

在“文化大革命”中，财政部也受到了冲击，特别是在1967年连续受到夺权和大批斗的考验。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特别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财政部广大干部确保国家财政大权始终掌握在党中央的手里，为保证国家政权正常运转，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上海纺织四厂搞“四清”。上海“一月革命”后，形势很乱。有天晚上，纺织四厂领导悄悄找到我，说北京让你回去，你快走吧，到明天就走不了了。我听后连夜乘火车赶回北京。回到北京时财政部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处贴的是大字报。有张大字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部执行的是刘少奇的“黑线”。我很气愤，回去就写了张大字报贴了出来，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部执行的是毛主席的“红线”。

在“一月革命”的冲击下，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领导干部，大都成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揪斗的对象。面

财政
文学
CAIZHENGWENXUE

对这种险恶的情势，周总理悲愤不已，深感不安，决定采取保护措施。经与几位副总理商议，他提出以国务院通知开会、汇报工作和写检讨等名义，让受冲击的部长、副部长们住进中南海“工字楼”宿舍，保护起来，其中就包括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吴波。

1967年1月，财贸口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开始酝酿夺财政部的权。1月，财政部的造反派宣布打倒吴波，夺财政部的大权。财贸口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也进驻财政部，成立所谓“接管委员会”。财政部的工作几近瘫痪。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李）先念同志到财政部解决问题。先念同志到财政部后先找造反派代表谈话，规劝他们放弃夺权，但被造反派代表拒绝。先念同志非常气愤，对造反派代表和支持造反派夺权的个别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然而，造反派不但不服从，反而把他的指示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中宣扬，然后串联起来，提出“打倒李先念”的口号。周总理在听取先念同志的汇报后，决定与先念同志一起，接见财贸口的群众组织代表，制止造反派夺权，保住国家的财政大权。

1967年2月17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召开财贸口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会，严正宣布财政大权属于中央，不容造反派夺取，要立即缴回，并当场下令解放军战士将支持造反派夺权的财政部某位副部长逮走。周总理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是得到毛主席同意的。

周总理的斗争艺术很高明，他没有说不能夺权，只是说中央财政大权不能夺，

只能监督。这就宣布并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凡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权，特别是国家外交、财政等权，都属于中央、属于毛主席，造反派不准夺取，从而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效地刹住了这股邪风。

周总理在和造反派代表谈话时，还多次谈到财政部的成绩，指出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财政上把外债还清了，把内债也很快还清了，赤字没有了。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跟我们相比呀？帝国主义、反动派、修字号三类国家，不是有外债，就是有内债，像美国那样，有多少内债呀！财政上有赤字，还有多少亿的各种内债。财政部正是在毛主席路线的指导下，才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周总理积极支持先念同志的工作，他说，先念同志曾经提出不兼任财政部长，毛主席说不行，得兼。毛主席信任他，我们信任他。周总理讲完之后，先念同志在讲话中也对造反派代表提出了严厉批评。

1967年2月18日，周总理、先念同志又在中南海接见了财贸口部长、司局长。我也参加了这次接见，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周总理对财政部造反派夺权很生气，教导我们要捍卫国家财政大权。周总理说：“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周总理指出，国防、公安大权既不能夺，也不能监督。财政算第二类，可以监督，但不能夺。中央规定业务权只能监督，超过了限度，就要走到邪路上去。谁要夺中央的财政大权、经济大权，我们就要起来保卫。不起来捍卫毛主席直接掌握的大权，就是犯罪。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我十分激动。我觉得多亏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财政部的支持，特别是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否则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会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

会后，先念同志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坚决不让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坚决支持财政部各部门照常工作。1967年2月25日，财政部向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厅局发电指出：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家财政大权属于中央，财政部的革命造反组织只能夺运动的领导权，不能夺财政部的业务领导权，但对业务可以进行监督。现在我部党组已经恢复工作，业务领导权已经收回。前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以“造反司令部”名义发出的有关财政工作方面的文件一律无效。

因为财政部工作的重要性和在财政部出现的这些斗争的复杂性，党中央、国务院为防止各种可能的破坏，确保对中央财政大权的控制及其正常运转，果断地决定对财政部实行军事管制。196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公布《关于对财政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决定指出自即日起对财政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任命殷承祯为军管会主任。军管会下面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负责部内工作。决定还指出，实行军事管制后，对外活动如需要以行政首长名义签署或接洽的，仍按过去规定办理。行政首长已撤职或停职的，应由上级指定适当人选以代理人名义出面。党中央、国务院的这一决定受到了财政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1967年7月19日，财政部军管会发

出通知，决定成立临时业务领导小组。经军管会研究，报请国务院同意，在没有组成有群众代表参加的业务领导班子之前，确定在军管会统一领导下，由刘洪章、吴波、谢明、姚进、王程远和我组成临时的业务领导小组。刘洪章、吴波分任正副组长，具体负责主持业务行政方面的工作。

军管会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对于基本维持财政工作正常进行、保证财政部业务工作不间断发挥了历史作用。特别是军管会主任殷承祯，在原则上坚决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放手让业务组开展工作，不干涉财政业务，对财政部原来的司局长也采取保护和 supports 的态度，不让他们随便遭到批斗。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殷承祯对先念同志非常尊重。中央让先念同志就“二月逆流”事件回财政部作检查的时候，殷承祯亲自去门口迎接。先念同志做完报告时，他还带头鼓掌，并在会后写了简报，向中央反映先念同志的检查报告好。这在当时是对先念同志很大的支持。

财政业务在“文化大革命” 中照常坚持

1969年10月，林彪“一号命令”下达后，财政部各业务司局除留少数人组成业务组外，其余人员都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财政部由600多人缩减成为70多人的业务组。当年，国务院精简机构，人民银行并到财政部，一起在财政部大楼里办公，所以机关大楼门口挂两块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

人民银行”。财政部与人民银行合并后，业务上分为4个组：综合组（由原来财政部预算司和人民银行的计划局组成）、财政业务组（由财政部业务司局组成）、银行业务组（由人民银行业务司局组成）和办事组（由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办公厅组成）。每个组下面又分为几个小组，基本上一个司局一个小组。我担任综合组组长。在当时人手少和社会复杂的情况下，财政部留下来的人依然坚持工作。当时工作量非常大，规定每周一、二、四、五晚上都要加班，遇有急事，加班时间更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支持下，国家的财政业务在“文化大革命”中靠几十个人依然艰难维持，基本保持正常运转，为维持财政平衡、维护国家财经秩序、支持经济建设和开展对外援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贯彻中央4个文件，竭力维持财政平衡

在全国刮起夺权的风潮中，两派群众严重对立，武斗日趋频繁，无政府主义思潮恶性膨胀。在一段时间内，企业管理混乱，财务制度松弛，截留国家利税的行为不断发生；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现象严重，财政工作陷入重重困难，财政收入连续下降，很难维持财政平衡。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确保财政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实现国家财政收入任务，维持财政平衡，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发出一系列通知，对上述现象，坚决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极大地支持了财政部门的工作。

1967年6月22日，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关于进一

步“抓革命、促生产”，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通知》，指出一切企业纳税单位都要努力增加生产，按规定向国家缴纳税款和利润，不许挪用和拖欠；已经挪用的，必须归还；已经拖欠的，必须补交。同年8月20日和次年2月18日，针对不少单位借“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铺张浪费，乱花公款以及把集体所有制企业随意转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等歪风，又先后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

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及时发布《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当时有些人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暂时利益，强行要恢复和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已经废除的一些错误措施；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要求晋级加薪，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物资，鼓动学徒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要求转为正式工；煽动学校的毕业生对工作分配及分配后工资待遇等问题提出各种不合理的经济要求；一些干部不讲原则，随意签字答应条件，有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不按国家规定，强行向银行贷款，随意分掉党费、团费、工会福利费、机关职工福利费和企业的职工福利基金等。这股风气一时甚嚣尘上，给财政和银行工作带来了更大的被动和困难。通知对此进行了坚决反击，对于制止当时的混乱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上4个文件，都用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以布告的形式发布，张贴在墙上，布告周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在当时那种特殊形势下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这样就有权威性，要不然我们宣传人家听不进去。

“文化大革命”10年中，有4年出现财政赤字，但6年是维持平衡的。虽然总体上有赤字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央连发的4个文件，没有财政部努力维持平衡，赤字会更大。

（二）针对时弊，强调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财政分配体系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保证了国家财政政策法规的顺利贯彻执行与财政收支任务的胜利完成。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受到严重践踏。由于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无视国家财经纪律，有章不循，各行其是的现象到处都是。在此期间，预、决算制度也曾一度中断和未严格执行，1967年、1968年两年国家就没有正式的预、决算报告，形成新中国财政史料上的空白。在收入方面，侵占、截留国家财政收入，化预算内资金为预算外资金以及扩大成本范围者有之；公开抗税不缴和超越权限减税免税者有之。在支出方面，基本建设投资“大敞口”，花钱“大撒手”，施工吃“大锅饭”的情况相当普遍。有些企业管理混乱，长期亏损，靠国家补贴过日子，却心安理得。有些单位乱建楼堂馆所，大肆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金，

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有这些，实际上造成了许多合理的财政规章制度“不破自废”的严重后果。这不但践踏了财经纪律，分散了国家财力，而且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腐蚀和毁灭了一批干部。

在这种背景下，我让部里各个司局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制度文件。当时整理出的文件非常多，我们就挑出最重要、针对当时时弊的文件汇编在一起，以财政部办公室的名义印发了《财政制度摘编》。这本书对于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认真执行财政制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71年林彪叛逃坠机之后，在该飞机残骸中发现了外汇。有工作人员到财政部查问林彪外汇的来源。财政部的同志回忆说，是曾有两个军官来财政部要过外汇，但财政部坚持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没有批。后来查清林彪的外汇是从别的渠道得到的。这件事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三）坚持召开财政工作会议，推动财政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时局复杂的背景下，财政部依然坚持召开财政工作会议，分析财政收支情况，交流经验，为推动财政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7年10月，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会上，财政部军管会正、副主任殷承祯、刘洪章作了讲话，我作了《关于1967年国家财政收支情况的说明》。1968年9月中旬，全国财政工作座谈会分别在北京、杭州、长沙、沈阳、西安5个地方同时召开，历时5~7天。会议认为由于贯彻了“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和中共

中央2月18日《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全国群众性的节约工作做得很出色。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初步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1970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财政座谈会召开，我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1970年7月，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银行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财政银行工作的改革问题。在当时那样混乱的情况下，组织这些会议非常困难，今天想来，实在难能可贵。这些会议的召开，对支持、保证各地、各部门财政工作的正常运行，发挥了很大作用。

（四）国家财政在困难中支持经济建设

十年动乱期间，国家财政在困境中发挥分配、监督的职能，多次采取增加收入、节约支出、冻结单位在银行的存款、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货币投放等措施，除了保证国家最低限度需要的经常性开支外，集中有限财力，积极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不少成绩。

在这十年期间，农业方面，建设了大批水利工程，使其配套发挥效益，农业现代化的装备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从而使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工业方面，建设了一批大型工业企业。最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在这个时期中进一步探明了石油资源，国家原油产量1976年达到8700多万吨，使中国由贫油国一跃成为能够自给自足的产油国。

交通运输方面也有进一步的改善和加强。这个时期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南京长江大桥全长6700米，是具有世界

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于1968年完工。

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这个时期，我国广大科技人员在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推广、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然，国家财政通过其分配活动取得这些建设成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辛勤劳动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在承受极大灾难中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这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文化大革命”严重阻碍和桎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这场十年浩劫，国家建设必将有更大的财力保证，财政资金分配活动将会失误更少，整个经济效益将会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将会更大。

（五）坚持开展对外援助

我国对外援助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已开始。1966~1970年，中国继续支援亚、非、拉美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发展民族经济，向37个国家提供了巨额援助。1970年，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谈话中批评第四个“五年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提出要由原定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1971~1975年，即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先后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援助，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特别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急剧增长。在此期间，对外援助总金额比上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增长1倍以上。到1972年年底，对外经济援助超过400亿元，其中越南、朝鲜、阿富汗占80%。当时我国自身经济和财政非常困难，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目相当可观的财政援助，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要求我国给予援助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但是，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财政收支出现了较大赤字，没有力量再拿出过多资金进行对外经济援助。为此，中共中央于1975年4月决定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将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四五”时期的6.5%降到5%以内，援外资金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时期的水平。同时，要求援助项目一定要保质保量，经济实用，使受援国得到效益，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财政工作的整顿和推进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先后主持中央工作。他们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忧心忡忡，决定尽快通过整顿，使各行各业进入正轨，改变混乱局面。财政部在这一时期也开始了一系列整顿工作。

（一）第一次整顿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总理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1972年，财政部为了贯彻周总理关于整顿的精神，在国民经济领域开始了第一次整顿。1972年10月，财政

部在“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上，坚定了“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的认识，提出“国家要积累”的观念，号召大家促进生产，抓社会主义积累。这种思想上的整顿，澄清了一些是非，给财政、经济工作的整顿打下了基础。在整顿机构方面，全国各地陆续恢复了税务机构，增加了税务人员。原附设在财政部业务组下面的税务组，也于同年恢复税务局建制。与此同时，在财政部恢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各省、市、自治区恢复建设银行分行。机构的恢复和人员的充实给财政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整顿企业财务方面，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集中批判了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的错误思想，提出切实抓好企业整顿、严格实行经济核算、落实企业生产计划、改进企业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措施。通过国民经济第一次整顿，整个财政工作有了转机，经济形势和财政形势有了好转。

这一时期，在整顿的同时，我们还抓住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部分解除对我国封锁禁运的时机，大规模从西方国家引进设备，以推动经济发展。以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为突破口，不断扩大对外引进交流规模，最终形成了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国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贸易领域被封

锁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 51 亿多美元。

（二）小平同志复出和第二次整顿

1973 年夏季的一天，军管会通知我、殷承祯和蒋乐民下午到国务院西花厅开会。这次会议要求各部门军、干、群各 1 名代表参加。到了西花厅不久，周总理健步来到大厅，向大家宣布：今天我把你们的一位老领导请了回来，他就是邓小平同志。此时小平同志被请了出来和大家见面，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周总理说，小平同志恢复工作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说小平同志“绵里藏针”，思想强、工作能力强。周总理还说小平同志虽然受了批评，但精神仍很好，不气馁，现在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其他工作待毛主席、党中央另行决定。我能亲身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感到一种莫大的幸运。不久小平同志又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重任，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

1975 年 1 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小平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周总理带病参加会议，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届全国人大象征着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已有意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5 年，财政工作在全面整顿中，采取一系列措施，整个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1975 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任命张劲夫同志

担任财政部长，同时撤销财政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司、局组织建制，逐步把财政工作纳入正常轨道。

支持唐山救灾重建

“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里共发生了 8 次震级较高、破坏力较大的地震灾害，始于 1966 年，终于 1976 年，天灾与人祸共始共终。财政部对地震灾害十分关心，不仅拨款救灾重建，还多次派人到现场慰问和调研。我在这里着重谈谈亲身参与救灾工作的唐山大地震。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里氏 7~8 级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及附近地区。地震使唐山市工业建筑震毁 90%，民用建筑几乎全部震塌，造成 24.2 万人死亡，重伤 16.4 万人，直接损失达 30 亿元。这对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真可谓雪上加霜。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华国锋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临视察。我和陶省隅同志代表财政部于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去唐山地震灾区，查看了机关、学校和企业的受灾情况，研究如何救治，并和河北省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我就带了陶省隅一个人，当时刚刚地震，去的人不能太多。预算方面，我自己都懂，没有必要带人。唐山是一个工业地区，这次去了解情况，主要是接触工厂，考虑怎么恢复生产、怎么筹划资金，所以带了陶省隅。两个人坐了一辆面包车过去。当时带面包车，主要是想可以睡在里面，因为唐山那边的情况，我们还不太了解。到了那边以后，才知道国家计委副主任李

人俊已经在唐山飞机场搭了一个席棚。我们就住在席棚里，比住在汽车里好，吃饭自己做。国家计委的同志也希望财政部领导能住在那里，研究筹资问题更方便些。唐山财政局陪同我们的那位同志一家七口就剩他一个，财产就只剩一块手表，祖孙三代都没了，还陪着我们到处调查。这种精神，实在让我感动。当时我们就到处去看，主要是工厂，也去过一个煤矿。地震死亡人数太多，一时又不能殡葬，我们看了以后心里很难受。当时，唐山开滦煤矿正在井下工作的万名工人和干部，除坚守岗位牺牲的17人和几名失踪者外，其余全部安全升井，撤至地面。这是一个奇迹。后来唐山恢复重建，煤矿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在唐山待了一个多月，回来以后拨款救灾。中央财政拨付救灾款3.9亿元。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在北京坐镇，其间也到过唐山了解情况。我们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国务院认为，财政部报的都是第一手材料，提的意见比较切实可行，予以采纳，所以后来唐山的恢复重建基本上是按财政部的意见办的，财政部为此出了很多力。此后，从1976年开始到1980年，国家财政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先后给唐山拨款33.6亿元，其中救灾款11.6亿元，基本建设投资22亿元。国务院核准当年减征河北省农业税指标1285万元，同年地震灾区的工商税也得到了相应的减免。

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使唐山人民能够迅速地战胜困难，在地震的废墟上建起新的家园。重建后的新唐山我也去看过，总体规

划改变了震前分区混乱、工厂和住宅混杂交错的不合理布局。全市分为新区、市区和东矿区，三大片呈三角形分布，组成一个和谐、漂亮、疏密有序的整体。一个个住宅小区、一座座高层楼房拔地而起，一个新型的城市在地震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看到这些巨大的变化，我感到十分欣慰。

安定团结是财政发展壮大的基础

从“文化大革命”的10年情况看，安定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政治局面安定，全党上下集中精力抓生产建设，经济发展就快，财政收入就增加得多；反之，国家财政就举步维艰。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的情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一五”时期年平均递增12.2%；“二五”时期，因为“大跃进”运动，年平均递增仅0.2%；三年调整期间年平均递增14.7%；“三五”时期年平均递增7%；“四五”时期年平均递增4.3%。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基础，就不能以盲目的政治运动冲击经济发展。“文革”时期是财政极度紧张和问题最多的时期，这里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有“左”倾错误对经济建设的严重影响。

现在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十分正确的。我们要珍惜今天政治安定、社会和谐的局面，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不断增强国家的财政实力。

（本文转自作者《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

陈云打算盘的智慧

曹伟明

今天是陈云同志 110 周年诞辰纪念日。笔者以文缅怀，回忆了陈云同志善打算盘精算账的一些往事，并写下来刊登在《上海滩》2015 年第 6 期上。

1905 年 6 月 13 日，陈云出生于上海青浦练塘的下塘街。

1913 年，陈云曾就读于镇上刘梅安所办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914 年，他在镇上的貽善初等国民学校求学。1917 年，进入青浦县立乙种商业学校学习珠算、簿记等课目，寄宿于青浦县城的码头街 8 号裕丰客栈的中药仓库。在这里，陈云接触到了财务会计知识，学会了打算盘，还学会了记账册，掌握了经济学的原理。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5 年 1 月到 1961 年 7 月期间，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四次来到家乡青浦，深入基层，深入农村，体察实情，了解民生。

1961 年，为了寻找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办法，陈云再次来到了上海青浦的农村，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蹲点调查。他马不停蹄、日以继夜地访农户、下田地、看猪圈、召开各类座谈会，实事求是地查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用打算盘的方法，客观冷静地算了一笔笔“三农”发展的经济账，反映了农民的心声，形成了《青浦农村调查》

报告。

善做加法 私养猪比公养猪好处多

小蒸公社原是青浦农村养猪最多的地方，1958 年公社化后，养猪却是一年比一年少。1958 年为 6869 头，1959 年为 5700 头，1961 年只剩下 3777 头。陈云在调查中发现，“公家养猪的地方脏得一塌糊涂，小猪、大猪、病猪、好猪都是格式化的饲养，吃一样的饲料。而农民家里养的猪，都是干干净净，还捉泥鳅喂猪吃”。

在养猪座谈会上，陈云启发大家说：“你们现在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为什么越养越少，越养越不好？”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发言，倾述苦衷。归纳起来，这几年上面强调公家养猪，有四个“跟不上”的弊端：一是饲料跟不上，猪饿死；二是管理跟不上，猪养不大；三是劳力跟不上，饲养不到位；四是保暖跟不上，好些猪冻死。然而，陈云在农村实地走访时，看到社员自己养的猪，不仅成活率非常高，达到 99.2%，而且饲养照顾很到位，积极性和经济效益都很高。陈云通过一看二听三算账，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小蒸农村，

无论母猪还是肉猪，私养比公养的好处多：私养猪饲料比较充足；私养猪比公养猪长肉多；私养猪比公养猪积肥多；私养猪可以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私养猪还节约稻草。因此，私养猪能赚钱，公养猪却要亏本。

陈云指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陈云还特别强调，中央关于“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肉猪饲养政策，同样适用于母猪的养殖。最后，他的调研成果，形成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报告，扭转了农村养猪的困局。

精做乘法 种双季稻得不偿失

青浦的小蒸地区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过去不种双季稻。但是在“大跃进”运动中，有些领导好大喜功，把单季稻改为双季稻，以此来提高粮食产量，并规定了播种指标，搞强迫命令。当时，青浦农民对种双季稻很有意见，因为“种出来”的后季稻不饱满，西北风往往能把稻秆吹倒。农民形象地说，种“双季稻”要“双脚跳”，“老天爷不帮忙就变成伤心稻”。

陈云通过实地察看、走访，在农民的座谈会上，他精确地算了这样一本账：“种双季稻表面看比种单季稻多收220斤上下，但实际上看，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都很大，各项损失总和约300余斤。”陈云自信地娓娓道来：由于种双季稻要在单季晚稻中寄秧，寄秧田将因此少产稻谷约150斤；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用稻种40斤；加上

种双季稻不能种夏熟作物，如蚕豆、小麦，又损失了60至80斤。此外，种双季稻多用肥料、多用劳动力等，成本支出较高，又折算掉几十斤的稻谷。陈云根据小蒸农村的实际情况，得出“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加种蚕豆效益好”的结论。

1960年，小蒸周边的嘉兴地区的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到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但却减了产。对这个新的耕作制度，广大农民都不适应，农业科学家也有不同看法。最后，陈云形象地说：“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种双季稻是得不偿失，应该因地制宜，顺应自然，做好乘法，才能让农业的效益最大化。

敢做除法 才能消除小偷小摸

陈云在青浦农村对小蒸进行调查时，农民反映强烈的是：当时青浦农民生活困难，小偷小摸多，集体利益受损的现象普遍。陈云走访了群众，查阅了相关资料，对小蒸公社农民自留地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并召开了自留地问题的座谈会。会上，广大农民反映自留地太少，而且多为“杂边地”，即路边、河边、塘边等大田之外的零散土地，满足不了农民吃菜充饥的需求。陈云反复权衡以后，赞成大家的意见，主张农民增加自留地。他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吃饱肚子、渡过难关，还可以消除农民小偷小摸的问题。

陈云说：“土地少的地方，自留地的比例要高于5%~7%，甚至7%~8%。高产地区如果还继续这样搞，农民肚子很饿，要保持高产，就没有办法。你不给自留地，他就偷。今年6000亩红花草，农民成群结队吃掉4200亩，结果晚稻肥料很少。